

近年来我国道教发展状况的数据分析

——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与方法*

闵 丽

提 要：本文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收集与分析了近年来我国道教发展状况的相关数据。具体而言，根据我国政府 1997 年、2018 年先后发布的宗教白皮书的相关数据，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等相关统计数据，可以揭示近年来我国道教发展的概况：其一，道教教职人员、宫观场所、团体组织及院校数量呈快速增长态势，但与其他四大宗教相比则相对缓慢。其二，道教普通信徒人数在被调查者（含非信徒与信徒）中，特别是在五大宗教信仰群体中的占比相对偏低，增长相对平稳。这种发展状况的形成，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与政策性支持、道教思想的当代价值以及道教界人士弘道的努力程度与方式紧密相关。

闵丽，哲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题词：中国道教 数据统计 发展概况 成因分析

为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提升文化自信、保障文化安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7 年 1 月颁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良性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支柱之一的道教，其现状如何、是否具备担当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重任的条件等问题，在新形势下凸显出来。为此，本文收集与整理了近年来我国道教发展的相关数据，试图通过分析其发展状况及成因，为回应道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问题提供参考材料。

一、近年来中国大陆道教发展状况的相关数据

近年来，我国道教在教制建设、人才培养、

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道教信仰与组织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对此，笔者拟从纵向和横向视角，介绍我国道教在教职人员、宫观场所、道协组织、道教院校及在校学员等方面的具体数据，以及道教普通信徒在被调查者（含非信徒和信徒）中的大致占比情况。

（一）近年来道教教职人员、宫观场所、道协组织、道教院校及在校学员的相关数据

从纵向看，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颁发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1997 年）、《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2018 年）白皮书及统计数据，以及 1997 年中国道教协会成立 40 周年时公布的相关数据，可以了解 20 余年间道教发展的概况，具体发展情况参见表 1。

表 1 1997—2018 年道教发展状况一览表^①

时间	宗教教职人员数量（万人）			宗教活动场所（座）			宗教团体或组织（个）			宗教院校（所）		
	宗教教职人员总数	道教教职人员总数	道教教职人员所占比例	宗教活动场所总数	道教宫观总数	道教宫观所占比例	宗教团体总数	道教团体（协会）总数	道教团体所占比例	宗教院校总数	道教院校总数	道教院校所占比例
1997 年	30	2.5	8.33%	85000	1500	1.76%	3000	133 ^②	4.43%	74	1 ^③	1.35%
2018 年	38	4	10.53%	144000	9000	6.25%	5500	600 ^④	10.9%	91	10	10.99%

表1中的数据表明,在1997—2018年,道教教职人员净增1.5万人,增幅为60%;道教宫观数净增7500余座,增幅为500%;道教团体或协会数净增467个,增幅为351%;宗教院校数净增9个,增幅为900%。上述数据说明,1997年以来20余年间,我国道教人才队伍、活

动场所与学校等数量呈快速增长态势。

从横向看,我国政府发布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2018年)白皮书及五大宗教的统计数据,能够反映道教的最近发展状况及其在国内五大宗教中的占比情况,具体情况参见表2。

表2 2018年道教教职人员、活动场所、团体组织、学校及学生在国内五大宗教中的占比^⑥

宗教教职人员数(人)			宗教活动场所(座)			宗教团体或组织(个)			宗教学校(所)			宗教类学生(位)		
宗教教职人员总数	道士总人数	道士所占比例	宗教活动场所总数	道教宫观总数	道教宫观所占比例	宗教团体总数	道教团体总数	道教团体所占比例	宗教学院总数	道教学院总数	道教学院所占比例	宗教类学生总数	道教在校学生数	道教在校学生所占比例
380000	40000	10.53%	144000	9000	6.25%	5500	600	10.9%	91	10	10.99%	10000	250	2.5%

表2的数据显示,在五大宗教中,道教教职人员的占比为10.53%,宫观场所占比为6.25%,道协组织占比为10.9%,道教院校占比为10.99%,道教院校在校生占比为2.5%。说明在五大宗教中,道教的教职人员、活动场所、道协组织、宗教院校及学生数量的占比普遍较低,显示出道教发展相对弱势的状态。

(二)近年来中国大陆道教普通信徒在被调查者(含非信仰者和信仰者)中的占比

关于我国道教普通信徒的人数问题,一直困扰着政界、学界和教界。所谓道教普通信徒,是指具有道教信仰、在道教组织或宫观中没有教职的一般信徒,因而区别于道士等教职人员。由于

没有严格的入教程序,道教普通信徒的人数难以准确统计。但是,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相关统计数据,以及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相关统计数据,可以了解道教普通信徒在被调查总人数(含信徒与非信徒)中的大致比例,及其在五大宗教信仰者中的大致比例,可以了解近年来我国道教普通信徒人数的大致增减态势。^⑦

首先,根据中国人民大学2006—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相关统计数据,可以大致了解近年来我国道教普通信徒人数在各类宗教信徒中的占比及增长情况,具体情况参见表3。

表3 2006—2017年中国大陆道教普通信徒在信仰者中的占比(CGSS)^⑧

占比 时间	被调查的总人数(人)	有宗教信仰人数 ^⑨ (人)	信仰道教人数(人)	信仰道教人数在被调查总人数中的比例	信仰道教人数在有宗教信仰人数中的比例
2006年	10151	1349	20	0.20%	1.48%
2008年	6000	567	12	0.20%	2.10%
2010年	11783	1521	23	0.20%	1.51%
2011年	5620	632	14	0.25%	2.22%
2012年	11765	1767	31	0.26%	1.75%
2013年	11438	1334	40	0.35%	3.00%
2015年	10968	1182	25	0.23%	2.12%
2017年	12582	1346	31	0.25%	2.30%

表3中的数据表明,在2006—2017年间,道教普通信徒人数在被调查总人数(含信徒与非信徒)中的所占比例,从2006年的0.20%增长至2017年的0.25%,大约增长0.05%;道教普通信徒人数在各类信仰人群中的所占比例,从

2006年的1.48%增长至2017年的2.30%,大约增长0.82%。这些数据表明,大陆道教普通信徒人数在11年间略有增长。

其次,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相关统计数据,可从另一个调查路径

印证表 3 中的数据及结论的准确性。CFPS 数据库中有道普通信徒在被调查者（含非信仰者和信仰者）中平均占比的相关统计数据，也可大

致反映我国道教普通信徒人数在近年间的增长态势，具体情况参见表 4、表 5。

表 4 2012—2016 年中国大陆成年人的宗教信仰分布及其占比 (CFPS)^①

时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2—2016 年
占比	被调查总人数	信仰者在被调查总人数中的占比 (%)	被调查总人数	信仰者在被调查总人数中的占比 (%)	被调查总人数	信仰者在被调查总人数中的占比 (%)	各类宗教信徒和非信徒在被调查总人数中的平均占比
信仰	35719		37147		36892		
佛教	2273	6.4%	5352	14.41%	3338	9.05%	9.95%
道教	150	0.42%	344	0.93%	168	0.46%	0.60%
伊斯兰教	253	0.71%	248	0.67%	352	0.95%	0.78%
基督教	631	1.77%	729	1.96%	681	1.85%	1.86%
天主教	118	0.33%	122	0.33%	145	0.39%	0.35%
祖先崇拜	\		1650	4.44%	\	\	?%
其他信仰	91	0.03%	\		91	0.25%	0.14%
无宗教信仰	28592	80.05%	23133	62.30%	28449	77.11%	73.15%
无效问卷 (份)	3611	10.11%	5569	15.00%	3668	9.94%	11.68%

表 4 的数据大致反映了 2012—2016 年我国道教普通信徒的基本情况：其一，道教普通信徒在所有被调查者（包括信徒与非信徒）中所占的比例 2012 年为 0.42%，2014 年为 0.93%，2016 年为 0.46%。其间，2014 年比 2012 年增长 0.51%，2016 年比 2012 年增长 0.04%；其二，从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

等五大宗教信徒的平均占比来看，佛教排序第一（9.95%），基督教排序第二（1.86%），伊斯兰教排序第三（0.78%），道教排序第四（0.60%），天主教排序第五（0.35%）。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上述数据表明，道教普通信徒人数增长相对缓慢，在五大宗教信仰人群中的占比偏低。

表 5 2018 年中国大陆成年人宗教信仰分布及其占比 (CFPS)^①

时间	2018 年		
占比	被调查的总人数 (人)	信仰者在被调查总人数中的占比 (%)	备注
信仰	37356		
佛教	10098	27.03%	
道教	5935	15.89%	
伊斯兰教	1166	3.12%	
基督教	1759	4.71%	
天主教	1278	3.42%	
祖先崇拜	17515	46.89%	
相信鬼神	3110	8.33%	
相信风水	14159	37.90%	
其他信仰	\	\	
无宗教信仰	\	\	
无效问卷 (份)	\		

2018年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问卷的调查方法略有变化,即被调查者可在各类信仰中作多项选择。如果按表1至表4的数据分析方法对2018年调查数据作统计分析,便会出现以下情况:各类信徒人数之和(55020人次)大于被调查总人数(37356人),各类信仰者在被调查总人数中的占比之和(147.29%)大于100%。此外,2018年调查问卷中“无宗教信仰”“无效问卷”的数据缺失。因此,笔者单独列出2018年表5的相关数据供参考。

(三) 小结

表1、表2的数据从纵向和横向分别显示了1997—2018年道教教职人员及活动场所、团体组织、院校道生的发展状况,及其在国内五大宗教中的占比情况,揭示了道教人才组织和硬件设施的发展态势;表3、表4、表5的数据分别揭示了近年来我国道教普通信徒在被调查者(含信仰者和非信仰者)中的占比。分析上述表格及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近年来我国道教教职人员、宫观场所、团体组织及院校的数量呈快速增长态势(见表1)。但与其他四大宗教相比,道教人才组织和硬件设施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见表2)。

其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2017年中国大陆道教信徒统计数据及占比(见表3),以及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中国大陆各类宗教信徒占比数据情况(见表4),反映了我国道教普通信徒人数在被调查者(含非信徒与信徒)中,特别是在五大宗教信仰者中所占比例偏低,增长相对平稳的态势。

二、近年来我国道教发展状况的原因分析

唯物史观强调,宗教及各种思想观念形态是社会经济与政治活动的产物。用唯物主义视角与方法探究我国道教发展近况的成因,便不难发现,上述状况的形成,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政府的政策性支持、道教思想的当代价值以及道教界人士弘道的努力程度与方式等因素密不可分。

(一) 道教界人才队伍和硬件设施快速发展的原因

我国道教教职人员、宫观场所、团体组织、院校及学生数量的快速增长,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近年来我国经济较快增长态势为道教界人才队伍和硬件设施建设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GDP(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国家或地

区经济状况和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它的数量增减能够直观地反映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情况。近年来,中国大陆GDP增速较快。例如,1997年,我国GDP总量为79715亿元^①,至2017年达到827122亿元^②,20年间增长9.4倍。经济较快增长态势一方面提升了国家实力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从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商品市场、人才市场及其剧烈竞争,给身处其中的部分民众带来不安全感、不确定感甚至挫折感。他们愿意在宗教信仰领域寻找精神归处,并通过诸多“行善积福”方式资助宗教活动或宗教组织。而各类宗教组织由此获得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近年来我国道教教职人员、宫观场所、团体组织及院校的数量呈快速增长态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第二,近年来我国政府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及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为道教界人才队伍和硬件设施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与政策依据。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先后颁布《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1991年)、《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1994年)、《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办法》(1996年)等系列法规。2004年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宗教行政法规——《宗教事务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宗教工作进入法制化管理阶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为我国政府宗教治理法治化转型提供了政策依据。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宗教治理法治化建设目标。2017年国务院颁发的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作为一部蕴含法治理念及法治原则的法律文献,正是在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背景下出台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宗教工作方式经历了从政策性管理转变为法制化管理,再转型为法治化治理三个阶段,体现了我国宗教工作从制度化水平较低向制度化水平较高、从刚性管理向柔性管理的转变。2014年党和政府提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法治化内含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诉求,以及限制公权力滥用的基本精神,在政府宗教工作领域逐步转变为保护合法宗教及民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具体措施,为我国道教界人才队伍和硬件设施快速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此外,中共十八大以来确立的文化发展战略,为道教界人才队伍和硬件设施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针对近年来我国宗教信仰领域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执政党和政府从国家安全与文化发展战略需求出发,颁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坚定文化自信”、大幅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写入中共十九大报告^⑬。上述政策的出台,对我国宗教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就道教文化发展而言,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工作,被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道教界人才队伍建设、宫观场所与典籍整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快速发展。

第三,道教思想中的有益成分有助于弱化和消弭现代性危机,因而具有继续传承与发展的当代价值和社会条件。在社会快速现代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内含的“效率第一”原则及价值尺度,以及由此催生的竞争性社会和人关系,极易导致生态危机、人际信任危机,以及因过度竞争所致的个人身心健康危机。而道教独特的自然观、价值观和生命观,有助于弱化和消解现代性社会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危机:其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秉持不同于天人相克与现代掠夺式发展模式的思想观念;其二,“不为物役”“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⑭的价值观,提供了见素抱朴、无欲好静、淡薄名利、适可而止的行为原则和生活态度;其三,“我命在我不在天”、长生久视的生命观及其修炼方法,给当代人类提供了服食(如中医中药)和炼养(例如太极拳、太极剑等)的健身方法。道教的上述思想与修炼方式有助于弱化、消解市场经济条件下因过度竞争带来的生态危机、个体身心健康危机与社会危机,因而有其重要的当代价值。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家道教对自然、社会和生命的独特理解和精神追求具有补偏救弊功能,因而具有传承与发展的当代价值和社会条件,这是近年来道教界人才队伍和硬件设施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四,道教界人才队伍和硬件设施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道教界人士不懈努力的弘道。近年来,我国道教界人士为推进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主要包括人才队伍与组织建设、宫观场所的修葺完善、文献典籍的编辑整理等“硬件设施”建设,也包括规范与优化教制教规、道风修持与道德操守等“软件”建设。其一,近年来,道教组织及教内人士根据相关规定,主要采用以下办法提升人才队伍的数量与质量:一是通过增加传度授箓仪式频次,加大吸纳

道士从业者的力度;二是通过更多举办方丈升座仪式,加大遴选与任用玄门高道的力度。以2017年为例,我国道教正一派和全真派为了加快道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分别多次举行道士传度授箓^⑮、冠巾^⑯与方丈升座^⑰仪式,以招纳人才、续承道脉。其中,各地道教组织分别主办的道士传度授箓、冠巾活动近十次,参加活动的度生数百人^⑱;此外,为增强宫观的组织管理力量,道教界人士先后举办方丈升座仪式四次^⑲。上述传度授箓和方丈升座活动频次的增加,从一个时间节点上反映了道教教职人员及玄门高道遴选与任用的力度加大及强化态势。其二,通过加强道教典籍的收集与整理、道教院校教材的编写等工作,夯实道教传承与发展所必需的基础条件。近年来,为抢救与保护道教典籍,道教界人士积极推进道教典籍编纂与整理工程。2015年6月召开的中国道教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将编纂《中华续道藏》《道经精要》《道医集成》等道教典籍文献的工作确定为道教文化建设的重大项目之一;除道教大型丛书编纂工作之外,国家图书馆、中国言实出版社及部分道观联合攻关,对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进行深度研究、高仿复制,并出版发行^⑳。此外,为了适应国内道教院校招生与培养工作正规化,改善缺乏高水平、系统化、符合当代道教教育特点的通用教材的问题,道教界人士和学者联合攻关,就道教院校教材编写工作开展一系列活动^㉑,专题讨论道教院校通用教材编写工作,确定教材的编写规划以及编写设想、框架、体例和目录等问题。编撰全国道教院校统编教材,是推动道教教义及思想传承创新的重要环节;其三,针对个别道士戒持松弛、道行不高、道风不正、爱国爱教意识不强,难以承担道教文化传承发展历史使命的情况,道教组织在政府相关部门引导下,逐渐加大“道风与教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力度,旨在提升道教“软件”质量。例如,通过学习《中国道教协会道士规约》《宗教事务条例》、制定“规范教务活动管理办法”、升国旗、唱国歌、祈祷和平等多种方式,加强道风、教制教规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提升道教教职人员的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道教界人士的上述努力具有提升道教内力、强化弘道外功的“内外兼修”功能,有助于道教界人才队伍和硬件设施的快速发展。

综上,我国道教界人才队伍及硬件设施建设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既有有利的物质条件、法律保障与政策支持,也与道教思想的当代价值以

及道教界人士为弘道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密切相关。有利的经济与政治条件、良好的思想传承环境,以及具有弘道精神的道教人士,为道教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推动了道教人才队伍和硬件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

(二) 道教普通信徒人数占比相对偏低、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

近年来,我国宗教信徒人数出现总体增长态势,但道教普通信徒人数增长相对较慢,在各类信仰者中的占比相对偏低。这种情况说明,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道教在宗教信仰领域的竞争力相对不足。笔者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道教教义教理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进展有限,因而弱化了道教对现代国民及其精神生活与行为方式的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主义与无神论及其影响下形成的价值观已深入人心。这种社会历史环境对道教人士提出了更高的时代使命:即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不变的情况下,凸显道家道教思想中有助于消弭现代性危机的自然观、价值观、生命观及其伦理思想等观念要素及其行为规范,创造性地转化已被科学证伪的个别信条,对教义教规做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新诠释。能否推动道教思想及教义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道教能否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的关键环节。事实上,早在20世纪上半叶便已出现推进道教思想及教义体系现代化的尝试。民国时期陈撷宁先生提出“仙学”,以及部分当代道士和学者提出的“生活道教”“人文道教”“生命道教”等主张,都体现了当代人对道教教义信条现代化的思考。特别是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②的文化发展战略,对道教文化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即不仅要创造性地转化被现代科学证伪的个别信条,对教义教规做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新诠释,更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相适应,实现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但迄今为止,道教界和学界关于道教思想及教义体系现代化建设的研究总体上仍处于“应然”论证状态,尚无“实然”层面的、有影响的重大成果面世,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道教对现代国民的吸引力。

第二,道教过度商业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众对道教的认同。我国道教商业化萌发于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向钱看”

的价值观念对道教人士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许多宫观及道士高价销售香蜡,以算命、健身等方式收取高额报酬等现象较为普遍。道教商业化既有外部因素,如部分地方政府和商业资本的介入;也有教内人士戒律松弛等内部原因。此外,忽略宗教组织自养行为与商业行为的区别,是导致道教商业化乱象的认识原因。自养是道教生存发展的必需条件。道教宫观及道士开展正常的教务活动,可以接受宗教性捐赠,也可从事必要的经营活动。例如,在道观内经营素餐馆,开设宗教用品与出版物流通处,提供社会性宗教服务等。但是,如果道教组织与道士过于扩大经营力度与范围、抬高宗教服务报酬,并将之用于超出道士应有价值规范、生活原则的个人消费,或用于道观的奢侈排场,则有悖于“少私寡欲”等教义教理,其行为已超出道士自养的范围。可见,在经费的获得方式、收入与支出的用途等方面,道教自养行为与过度商业化之间有着本质区别。而道教过度商业化现象容易给普通民众留下“以教敛财”的负面印象,自然难以吸纳更多民众成为信徒。

目前,在实施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过程中,愈来愈多的国民关注道教。努力扩大道教文化的影响,是我国道教界人士的时代使命。加快道教教义教理的转化创新工作,培养更多业务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提高道教组织规范化管理水平,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宗教服务,是道教在宗教信仰领域中增强竞争力、提升影响力的有效路径。

三、结 语

道教自诞生至今18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发展与分化出诸多道派。深入研究道教发展史,不难发现,各个道派兴衰更替的过程,实际上是神仙信仰及修仙方式传承与演变的过程。而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条件、政治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变化,是推动道教发展与道派兴衰更替的基础。换言之,道教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今天,中国进入加快转型发展的“新时代”,对道教提出了加快自我更新的时代要求。中国现有的社会状况、政治法律制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关键要素作为道教发展的土壤,制约着道教文化传承发展与创新性转化的难易程度、速度、路径、方法与成效。道教界人士应抓住有利时机扩大道教文化影响力,积极回应时代需求与挑战,助力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建设事业。

(责任编辑:首之)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与我国宗教治理现状研究”(18BZJ064)的阶段性成果。

- ① 表1中的数据来源于官方文献及道教界领袖发表的公开讲话稿。其中,1997年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颁发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除注明出处的数据外),2018年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颁发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除注明出处的数据外)。而道教的教职人员、道观、团体组织、学校等要素的占比数据,由笔者根据上述官方文献及道教界领袖讲话稿中的数据计算而成。
- ②③ 谢宗信:《在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国道教》1997年第4期,第6、6页。
- ④ 李光富:《着眼新使命,突出抓好道教人才培养》,《中国道教》2017年第2期,第27页。
- ⑤ 表2中的数据来源于2018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颁布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笔者据此计算出道教教职人员、道观、团体组织、学校及学生等要素的占比数据。
- ⑥ 由于问卷调查受问卷发放的数量、地域分布、被调查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其提供的相关数据只能大致反映我国道教普通信徒数的增减态势。
- ⑦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调查数据库 CNSDA,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2008、2010、2011、2012、2013、2015、2017年原始数据(spss版)。说明:本文截稿前,“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最新数据更新至2017年。2007、2009、2014、2016、2018、2019、2020年的数据未见网站上传,故此处省略。http://cnsda.ruc.edu.cn/index.php?r=projects/index&Projects%5Btitle%5D=%E4%B8%AD%E5%9B%BD%E7%BB%BC%E5%90%88%E7%A4%BE%E4%BC%9A%E8%B0%83%E6%9F%A5&Projects%5Bcid%5D=&Projects%5Bcollection_date%5D=&Projects%5Bgeographic_coverage%5D=&bt=search%E9%AB%98%E7%BA%A7%E6%90%9C%E7%B4%A2。表3中的数据由冉灿博士收集整理,在此特别鸣谢!
- ⑧ 包括佛教徒、道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以及祖先崇拜、多信仰与他信仰者。
- ⑨ 数据来源:2012、2014、2016年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全国总样本。笔者根据表中数据计算出各类信仰者在被调查总人数中的平均占比(%)。<http://www.iss.pku.edu.cn/cfps/sj/>。说明:本文截稿前,“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最新数据更新至2018年。由于2018年被调查者可多选不同信仰,由此出现下述情况:其一,各类信仰者人数之和大于接受调查总人数;其二,信仰者在被调查总人数中的占比大于100%。故此,笔者单列表5,并录入2018年的相关数据。2013、2015、2017、2019、2020、2021年的数据未见网站上传,故此处省略。表4中的数据由冉灿博士收集整理,在此特别鸣谢!
- ⑩ 表5的数据来自2018年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全国总样本。<http://www.iss.pku.edu.cn/cfps/sj/>。特别说明:本文截稿前,“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最近的数据至2018年,2019、2020年的数据未见网站上传,

故此处省略。表5中的数据由冉灿博士收集整理,在此特别鸣谢!

- ⑪ 《中国历年GDP总量及增长率》,载于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12/27/20/37960839_804899143.shtml。
- ⑫ 《2017年GDP成绩单公布》,载于<http://www.mnw.cn/news/cj/1925808.html>。
- ⑬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第二版。
- ⑭ 《老子》第44章。
- ⑮ 所谓传度,即道教确认道士资格、职位的仪范。
- ⑯ 所谓冠巾,即全真道的学道之人正式成为道人的仪式。
- ⑰ 所谓方丈升座,既有登高座说法之意,也可为新晋升为方丈者的就职仪式。
- ⑱ 2017年7月3—7日,湖北省道教协会在武当山道教学院主办了传度人员培训班。7月22—24日,安徽省道教正一派首届传度活动在黄山市齐云山玄天太素宫举行。7月22—24日、8月25—27日、11月10—12日,广东省道教协会先后在东莞虎门郭都真人古观主办了首届、第二届、第三届正一派道士传度活动。10月14—16日,江苏省句容茅山道院2017(丁酉)传度活动在崇禧万寿宫隆重举行,160名度生参加了此次传度活动。12月11—16日,江西省龙虎山天师府举办丁酉年内地正一派授箓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280名正一道士在龙虎山天师府临坛授箓。12月18日,来自全国各地正一派道士170余人,参加了天师府丁酉年内地升授箓活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天师府第二次举办升授箓活动。12月28日,浙江省道教协会首届正一派传度法会在德清县烟霞观举行,78名度生和主持传度法会的道长共150余人参加了传度仪式。
- ⑲ 2017年8月21日—9月18日,山东青岛崂山太清宫举行了李宗贤方丈升座仪式暨丁酉年全真派道士传戒活动。9月20日,吉林辽源福寿宫为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吉林省道教协会会长赵理修道长举行了升座辽源福寿宫方丈的典礼。12月3日,湖南省衡阳市南岳衡山道院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道教协会会长黄至安道长升座衡山道院方丈举行了隆重典礼。12月23日,河南省登封中岳庙举行了黄至杰道长方丈升座典礼。
- ⑳ 周玮:《国家图书馆等将复制出版〈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见新华网“百家号”,2017年12月29日。
- ㉑ 例如,2016年11月18日,在福建厦门举行的全国道教学院教材编写工作会议,专题讨论了道教学院通用教材编写工作,对首批15本教材的编写规划及写作提纲进行了初步讨论。2017年1月6日,在北京中国道教协会召开的全国道教学院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具体讨论了15本教材的编写设想、框架、体例和目录等问题。同年4月22日,《中国道教史》教材编写大纲研讨会在陕西紫阳县召开。9月29日,《道教官观管理》教材编写研讨会在重庆市召开。10月24日,全国道教学院教材审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 ㉒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